

【理论探讨】

董仲舒“天人相应”对《伤寒论》的影响

姜 涛,包素珍[△],吕媛琳
(浙江中医药大学,杭州 310053)

摘要:“天”是中国最为古老而久远的哲学范畴之一,历代政治家、医家都对“天”有着不同的阐释。董仲舒提出的“天人相应”思想始于西汉,盛行于东汉,其核心思想为“天”是世界万物的主宰,具有浓厚的神学性质。东汉·张仲景受董氏观点的影响,其所作《伤寒论》在论述疾病的发生、发展、治疗及预后上都与“天”有着密切的关系,具有董氏“天人相应”的缩影。但张仲景认为感受自然邪气才是疾病发生的主要原因而非“天道”所主,同时疾病的发展和向愈受自然及人为干预的双重影响,强调“人为”的作用,具有浓烈的反神学性质,这已背离董氏观点,而与东汉后期出现的“天道自然”观相吻合。故《伤寒论》不仅具有伟大的医学价值,同时附带有鲜明的时代政治特点,具有一定的哲学价值。

关键词: 天人相应;天道自然;伤寒论;张仲景;董仲舒

中图分类号: R2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3250(2018)05-0573-02

Influence of DONG Zhong-shu's 'Heaven and Man Correspondence' on
'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s'JIANG Tao, BAO Su-zhen[△], LV Yuan-lin

(Zhejiang Chinese Medicine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3, China)

Abstract “Heaven” is one of the most historical philosophical categories in China and historians and physicians of all ages hav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it. “Correspondence of heaven and man” proposed by DONG Zhong-shu originated in western han dynasty and prevailed in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core of the thought is that heaven is the master of all things which has a strong theological nature. Influenced by DONG's thought, ZHANG Zhong-jing considered heaven has a close connection with the occurrence, development, treatment and prognosis of the disease and all these features are expressed in his book *Shang Han Lun*. But differ from DONG's opinion, he holds that the real etiology for disease is natural pathogenic factors. And the human interventions with natural causes lead to the development and curing of disease. This view negates DONG's philosophical viewpoint and has a similarity with the later theory “Heaven Tao and nature”. So *Shang Han Lun* not only has great medical value but also has distinct poli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with rich philosophical value.

Key words: Correspondence of heaven and man; Heaven Tao and nature; *Shang Han Lun*; ZHANG Zhong-jing; DONG Zhong-shu

1 东汉时期的思想风潮

“天”是中国最为古老而久远的哲学范畴之一。中国古代的思维模式造就了“天人合一”这一哲学命题,同时整体主义的“合一”也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特征和精髓^[1]。随着统治国家的需要,汉代的思想家、阴阳家董仲舒结合西汉时期的社会政治特点,将这一命题加以改造,构建了一套具有鲜明特色的“天人相应”理论。其所谓的“天”始终是纠缠在主宰之天与自然之天的双重性质中,既具有浓厚的神学性质,又具有广泛的人文性质^[2]。步入东汉以后,“天”的观念进一步神化,图谶之风愈演愈烈,作为反对神化“天人相应”观而出现的人化“天道自然”观,也慢慢出现在东汉时期的哲学舞台。

从人物背景看,张仲景出生于东汉时期,曾任长

沙太守,举孝廉,在当时政治、军事、文化变乱,而又瘟疫四起、民生凋敝的大环境下,作为医家、官家的张仲景目睹了国家的衰败与世人的疾患,感触尤深。从时代进程来看,张仲景既经历了董仲舒“天人相应”的全盛时期,也受到了“天道自然”哲学思想的影响,故其所著《伤寒论》也存在着独特的时代气息。

2 “天人相应”的时代烙印

汉代的主流社会思想,从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便进入了泛儒学时代。董仲舒为加强中央集权,将君权神化提出了“天人相应”的哲学观点。他认为“天”是创造、主宰宇宙间万物的至高无上的神。《春秋繁露·郊祭》云:“天者,百神之大君也”^[3],而人的一切都是“天命”,生老病死、祸兮旦福均为天数所生,天数为大,人数为次,人头应天圆,耳应日月,四肢对四季,眨眼应昼夜。董仲舒强调人与天无处不应、不可不察,张仲景受其思想影响,在疾病的发生、发展、治疗、预后上均有所察。

2.1 “天”与疾病的发生息息相关

作者简介: 姜 涛(1992-),男,江苏宿迁人,医学硕士,从事中医基础理论研究。

△通讯作者: 包素珍(1963-),女,浙江杭州人,教授,医学博士,从事中医基础理论研究, Tel: 13588397711, E-mail: b_s_z@163.com。

《春秋繁露·为人者天》云“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也,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3]“天孕育化生人的形和神,天之德足则民享安乐,天之恶贯则民受贼害,这种天谴式的生命观影响到张仲景,故在《伤寒论》中,疾病的发生与“天”有着紧密的联系。《伤寒论》第61条“昼日烦躁不得眠,夜而安静”,天有昼夜,人亦感之,则出现了白日燥烦的病态和夜而安静的常态,这种疾病昼夜转换的情况在《伤寒论》中并不少见。又如第30条“夜半手足当温,两脚当伸”,夜半阳气还,故手足冷、屈伸不利当解,可见病态、常态可随着昼夜而变化,存在昼病夜安或是夜病昼安的情况,即“天”对疾病的发生有着一定的影响。《伤寒论》中这种与时间相应的疾病发生模式,可以说是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在医学领域的渗透。

2.2 疾病的治疗预后需要“天”的布施

董仲舒将“天”作为神统治一切。《春秋繁露》云“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见其光,序列星而近至精,考阴阳而降霜露。高其位,所以为尊也;下其施,所以为仁也;藏其行,所以为神也;见其光,所以为明也;序其星,所以相承也;近至精所以为刚也;考阴阳所以成岁也;降霜露,所以生杀也。”^[3]此段话将“天”的统治地位加以概括,四时代御,风雨有时,日月星辰,霜露雨雪,生杀枯荣,都是来源于天。故人之所以能生存,疾病之所以能被治愈也赖于天的“仁”与“施”。《伤寒论》有平旦服十枣汤攻逐水饮,讲究服药要配合天时,借助“天阳”助药力祛水逐饮。水饮为阴邪,多留于阳分、气分易阻遏阳气,平旦即寅时,此时阳气渐隆,进服利水逐饮之药,既可以借营卫之气行阳之际载药直达病所,又可借平旦人体阳气旺盛增强药物行水利湿之功^[4]。在治疗疾病上,张仲景重视与“天”的配合,择时顺势治疗,充分调动人体内外抗病因素,以增强药物的效能。

关于疾病的预后,《伤寒论》中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即六经病欲解之时与特定的时辰相对应。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六经之病欲解之时,分别为从巳至未、从申至戌、从寅至辰、从亥至丑、从子至寅、从丑至卯。人体抗邪主要是通过阳气来发挥,阳气腾于天达于外,居外统内,敷布生机,赋予生命,故顺天时能加强人体自稳调节能力,激发人体排异拒邪功能^[5]。《春秋繁露》云“天之道,有序而时,有度而节。循天之道以养其身,谓之道也……天之数,人之形,官之制,相参相得也。”^[3]董仲舒提到天道有时序,人要顺着天道之序颐养其身,时辰为“天之数”,疾病为“人之形”,时辰与疾病治疗相参相得病才能愈。张仲景的“三阴三阳病应天时而愈”正与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相吻合。

3 “天道自然”的思想萌芽

董仲舒天人思想对历史的影响是深远的,其流行于西汉末并兴盛于整个东汉,而至东汉之时发展为一时极盛的谶纬说,即通过隐语、符、图、物等形式预言人事的吉凶祸福^[6]。随着图谶之风不断发展,人们渐渐意识到“天”不是主宰人世的神,董仲舒提倡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已不适用,反对神化“天人合一”的“天道自然”思想就应时而生了。正如东汉·王充提出的“祭祀之意,主人自尽恩勤而已……夫天者体也,与地同”^[7]。“天道自然”观认为,“天”只是自然产物,并无主宰与神明之力。张仲景崇医而忌巫,董仲舒的观点放之医学存在明显的巫医性质,因此摒弃其神学部分也是必然之事。

3.1 疾病的发生并非完全“天道”所为,而由感受邪气所致

东汉后期疫病流行,民不聊生,然而受到图谶之风的影响,百姓以为神灵所作。《春秋繁露》云“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3]又云“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至者,西狩获麟,受命之符是也。”^[3]这种天灾论的观点导致人民在面对疾病时采取巫术手段以求病愈。曹植《说疫气》云“建安二十二年,厉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户户有嚎泣之哀……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而愚民悬符压之,亦可笑。”^[8]张仲景视百姓疾苦,而又深知疫病为符咒所不能,故总结其治疗经验而作《伤寒论》。张仲景所言“伤寒”指的是一切外感热病,包括大部分急性传染病,而其所处的时代正当瘟疫四起,所以《伤寒论》可以说是针对当时肆虐的疫病所作。按照董仲舒观点瘟疫乃为“天之谴”,而在《伤寒论》则言:“从霜降以后至春分以前,凡有触冒霜露,体中寒即病者,谓之伤寒也……阳脉濡弱,阴脉弦紧者,更遇温气,变为温疫。”明确提出了触冒霜露、遭受温气等才致疫病的发生,并非“天”的惩罚。同时《伤寒论》中写到感寒者、风者等,其病因皆为自然界的邪气,所以其蕴含的发病观点已背离“神学观”而转变为“自然观”,与董仲舒“天人相应”的观点相违背,进而发展为“天道自然”。

3.2 疾病向愈与否并非完全“天道”所主,需要人事的配合

《春秋繁露》直接以祭祀为题的有7篇,董仲舒强调祭祀上天的重要性并言道“事天不备,虽百神犹无益也”^[3],拓展到医学领域,灾异来源于上天,应施以祝由之术才能将人类的疾病治愈。而通篇来看,《伤寒论》是一门方证对应的临床医学,强调通过一定的治疗手段达到疾病的治愈,其核心是通过疾病的具体表现而采用不同的方药^[9]。如麻黄汤证、桂枝汤证、小柴胡汤证等,以“汤证”命名表现方药与证候之间的相互对应关系,强调药物治疗,(下转第583页)

此理甚明,人所易晓,而待邪自解之法全赖附子、肉桂之力,此浅学者所以不识也。加橘皮、甘草取其行脾气而和中。服此方数剂,气力渐增,饮食渐进,若胸膈不爽、大便秘结,则以降中汤解之,不可用承气汤。

陈泽东于厉气、伏气两编所创65方,减去重复方2处(*标注),其自创或秘授之方合计63首。

2.3 治温方药,颇具特色

经对陈泽东治疗温热类疾病63首方子的常用药物频次及药性进行统计,总结其治疗温病用药的如下特点。

2.3.1 用药轻灵,辛散宣透 陈泽东用药轻灵(即用药轻、巧、灵、动),其常用药物有麻黄(14次)、紫苏叶(9次)、薄荷(8次)、金银花(9次)等为解表药,多属体轻宣散之品。所谓轻者辛散宣透,能去皮毛之实邪。辛散药如葛根(25次)、升麻(5次)、柴胡(5次)亦为其所擅用,其味辛气薄、质轻而浮,能解表透邪、开腠理而发汗,多用于外感六淫、邪在肺卫之证。他将其用于温病的各个阶段,不仅以其解表更用其透邪、泄毒,投药灵活。

2.3.2 调理脾胃,重视后天 陈泽东治疗外感温热病,常用脾胃经药,如厚朴(24次)、草果(15次)、陈皮(15次)、枳实(10次)等,此类用药频次偏高,说明治疗疾病以调理脾胃为重点,同时综合调理

其他脏腑气机,配伍相关药物以调理阴阳平衡为目的,在具体选择时则偏于轻清芳香透动的花、叶类药物以醒脾化湿。

2.3.3 用药统计,相互印证 陈泽东多用温药、平药,且“甘、苦、辛”3种药味使用频率最高,分析使用频次最高的前3味药,甘草(41次)入脾胃而益气补中,且能缓和药性、调和百药;葛根(25次)解肌退热、发表透疹之效显著,又有生津止渴、升阳止泻的作用;厚朴(24次)行气消积,温中燥湿,善除肠胃气滞、燥脾家寒湿,既能下有形之实滞,又能散无形之痞满,说明注重运用药物气味升降浮沉之理,升中有降,降中有升,调理气机以护脾胃。

陈泽东注重从临证实际出发,吸收经方、时方之长,融合伤寒、温病学说,两部讲义对伤寒和温病的阐释独具特色,论说更是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对在中医学界普及《伤寒论》,提高中医理论水平及临床技能产生了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 [1] 陈泽东. 国医伤寒讲义[J]. 国医正言, 1934(1): 10-12.
- [2] 陈泽东. 国医伤寒讲义[J]. 国医正言, 1934(5): 22-24.
- [3] 陈泽东. 国医伤寒讲义[J]. 国医正言, 1935(14): 14.
- [4] 陈泽东. 国医伤寒讲义[J]. 国医正言, 1935(8): 15.
- [5] 陈泽东. 温病讲义[M]. 天津: 无, 1918: 1.

收稿日期: 2017-10-15

(上接第574页)

这一点与通过祭祀而被动获得上天的赦免不同,是一种主动寻求解决疾病的方式。

而疾病的加重发展,在《伤寒论》中也有一套完整的体系,一方面为疾病的自然传变,另一方面则为医者的误治。“伤寒二三日,阳明、少阳证不见者,为不传也;颇欲吐,若躁烦,脉数急者,为传也。”张仲景认为六经病情时刻发展,一候不愈则可能传下一经,如太阳病不解则可转入少阳。张仲景的六经传变规律是疾病的共同特性,而这种传变模式是疾病本身固有的,与“天”的意志无关。同时《伤寒论》中也屡次提到医者下去、过发其汗等,强调疾病的进一步发展可因医者的错误诊断或错误治疗而产生。六经传变和医者的误治,一是自然的发展,二是人为的干预,并无涉及到“天”的主宰意识,这也否定了疾病的发生发展是“天道”影响的结果,这是其“天道自然”的又一体现。

4 总结

董仲舒的“天人相应”思想,在西汉末期提出,东汉时期达到顶峰,作为汉代时期的主流思想无疑会影响到当时的世人,而张仲景也不例外,其创作的《伤寒论》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伤寒论》中,我们不乏见到张仲景将“天人相应”理论应用在疾病的发生、发展、治疗及预后上,但作为一个伟大的

医家,其思想特点又与董仲舒有着明显的不同,他褪去了“天人相应”的神学色彩,更加重视人与自然对疾病的影响。如同当时反对董氏学说的思想家一样,张仲景顺应时代发展而迸发的思想火花是医学的进步,亦是古代哲学思想的进步。《伤寒论》作为一部医学典籍,表现出的不仅仅是张仲景的高超医技,同时也体现其顺应时代的思想进步,具有医学与哲学的双重价值。

参考文献:

- [1] 王素芬. 庄子“人与天一”的生态解读[J]. 河北学刊, 2010, 30(2): 39-43.
- [2] 康中乾. 董仲舒“天人感应”论的哲学意义[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4, 54(5): 106-115.
- [3] 苏舆. 春秋繁露义证[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 [4] 武鹏, 李金田. 试论《伤寒论》中的“天人相应”观[J]. 河南中医, 2011, 31(5): 450-451.
- [5] 蔺金松, 吴莹. 浅谈六经病欲解时[J]. 山东中医杂志, 2000, 19(8): 453-455.
- [6] 余治平. 董仲舒的祥瑞灾异之说与谶纬流变[J]. 吉首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3, 24(2): 47-51.
- [7] 柴荣. 论衡[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4: 227.
- [8] 张可礼, 宿美丽. 曹操曹丕曹植集[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9: 291.
- [9] 王方方, 陈家旭, 宋明, 等. 方证辨证发展脉络及应用前景[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7, 40(2): 103-106.

收稿日期: 2017-09-20